

三洲初委被破坏事件  
1930年4月

归档时的案卷号：

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

卷内共 份 张

保管期限



1930年8月中共满洲省委

83年1月16日

# 被破坏事件的回忆 内容提要

编号	(8)
分类号	
顺序号	5

引言	1.
一、我和党的关系	2.
二、事件的起因	8.
三、第一次捕人的情况	14.
四、第二次捕人的情况	15.
五、在“看守所”的情况	21.
六、获得自由	25.
七、尾声	27.
回忆可供参考的书籍等项	29.
X X	X X
X X	X X

## 引言

这是距现在(1982年8月)五十二年前的事。我亲历其事，回想起来，犹有餘痛。当时的中共满洲省委(刘少奇同志已回中央)，轻率妄动，竟使多年来艰苦积蓄的革命力量，几乎全部毁灭，是立三路线的恶果。

加以当时对敌斗争一年一度，未严格执行

又火上浇油地加重了这一事态。每一念及，是很为痛心的。

由于出现了两个叛徒——杜兰亭、陈尚哲，竟能带领或指示敌人捕去二十七、八个人，包括党团领导、党团员和革命群众。使东北革命，遭到很大挫折，是极为惨痛的。

有的记事，说捕去三十多人，有的甚至说是捕去四十多人，是传闻失实的，不可置信。这二十七、八个人中间，放了两个叛徒（杜兰亭、陈尚哲），还放了所谓“另案办理”的崔国政等六七个人；剩下了十九个人。这十九个人被一起拘留近一年，到1932年1月，才一同获得自由（参看后文）。

## 一、我和党的关系

在叙述这一事件之前，先说之我和党的关系。

1927年春（我虚岁十九），我去武汉。考入当时的“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”（即黄埔军官学校第五期），成了军官候补生。在总政治教官恽代英同志的教育下，思想激进；认为要革命就

必須加入中國共產黨。

蔣介石叛變後，使夏斗寅獨立師來攻打武漢。我校一千四百餘人，組成一個團。女生三百餘人，算一個營；其餘男生，兩個營。加上叶挺的一個團，編成中央獨立師；叶挺擔任師長。在武漢南“紗坊”和“土地堂”打了兩仗，把夏斗寅打跑了，保住了武漢。

在第二仗中，我勇敢作戰，負傷；住進在武昌的後方醫院。傷愈出院，軍校已解散。有些同學去南昌，參與了二一四起義；其餘星散，不知下落。

我返回漢陽，找到有關的人<sup>介紹</sup>，加入了共產黨。1929年劉少奇同志第一次和我談話時，不對我在大革命失敗後的革命情緒時入黨，予以贊揚。

當時軍校同學有鄧魯風，是遼寧省遼陽縣人，東北人民政府時代曾任教育部長，後任人民大學及北京大學副校長。以後知道的，有趙文棟，現在吉林省糧食廳工作，1928至1929年曾在中共滿洲省委秘書處工作，在林江反革命

集团迫害刘少奇同志时，他曾写过材料，说我于1929年秋少奇同被捕时曾参与营校工作，详见后文。另外还知道臧克家、符浩，也是当时军校的同学。

1928年(我虚岁二十)春，苏子元同志当时负责中共满洲省委工作，命我去台安县“中共特支”工作。公开身份是台安县立第七高级小学(校址黄砂坎)级任教员。校长王统一(心斋)同志是支部书记。在他的领导下，搞了青运工作，发展了一批团员。还办了农民夜校，搞些启蒙的农民运动。

1928年暑假后，党命我去铁岭县立师范中学合校当教员，教师范中学各一班的“国文”。因为只有我一个党员，所以仅仅搞些启蒙的青运工作，没有发展组织。

同年秋冬之交，党命我回沈阳市，以利于地下工作。恰好这时东北军阀头子张学良设立了专门研究汉学的萃升书院，自任院长。招收大学毕业五十人，再行深造。请了三名国学大师，做主教授。王树桐(晋桐)，进士，当过新

张布政使，主讲“经学”；单庭璠（何之），讲“史学”；  
 吴虞生（如），讲“词章”。另外，还有些讲师等。  
 我因从七岁起，连续读过九年私塾，通读了四  
 书五经，学写做诗词及以股文，有汉学基础，  
 就以同等学~~力~~考上了。这样，回沈阳，既当学  
 生，又做党的地下工作。这个“华升书院”，后来  
 并入“东北大学”，成为该校“国文学系”的研究机构。

“书院”是研究机构，并不天天上课，而且住  
 校、通学都可。党为我做地下工作方便，要我通  
 学。恰好这时我妻的姑父文运春（沈阳市人）在吉  
 林市当个小官，在沈阳灰小东关<sup>（即）</sup>齐庙南胡同  
 有一所“三正三厢”共六间房子，命我代管。我携  
 妻住正房一间，其余出租。

我当时除在“华升书院”学习外，兼任张学良  
 私立的“同济女子高级中学”国文教员，不久又兼  
 任张学良授意成立的“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”秘书  
 ，所以经济情况是好的。

党因为女同志太少，无法租房搞宣传部机  
 关，命我设法。我遂将代管房子中的两间正房  
 给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做机关，由我们掩护；

房租也基本上由我代付。

因房间宽大，故又兼充开会场所。

做为党传利机关，宣传部干系四川人、修路  
党团，住在那里。直到1930年2月，他才离去。  
他的来去，都是我代报户口并注销户口的，  
当地公安分所有案。

做为开会地点，自刘少奇同志以下，许多  
人都在那里开过会。我妻也是党员，守门站岗  
放哨，人称梁大姐。她1906年生，现仍健在，  
往事还能记忆。

X X

X X

X X

当时是共青团员，东北大学本科学士，后来成  
为叛徒的陈尚哲，居然也出入我掩护的宣传部  
机关兼会议场所，可见保密工作规则执行的不  
够严格了。敌人捕我时，就是他领来的，以后  
还要提及。

X X

X X

X X

1929年秋，我受党的指示，曾经营做过两  
个人。

一是一名工人，在做宣传工作呀，被人捉

送至商埠警察局管下的一个派出所。我以酗酒打架为理由，求我党兄郭庆益他当时是这个局的捐务主任帮忙，他打了一个电话，便使那一工人获得自由了。

另一人便是刘少奇同志。他是在纺织厂门前被捕的，纱厂女工多，可能有时稍挑逗有嫌疑；厂外堆料多，可能被怀疑为盗窃。我便以与政治总队的“匪存即盗”为理由，求我党兄郭庆益帮忙。主持其事的司法主任便以此为理由，叙述在送“检察院”的文书中；结局以“卸下”告终。少奇同志获得自由了。

林江反革命集团为了诬陷刘少奇同志，常邀蜀原“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”廖如愿同志及该处赵文栋同志，他俩都说是我党领袖。因此，林江反革命集团将我拘留近二年，软硬兼施，要我诬蔑刘少奇同志。我被折磨成骨性关节炎，也没有说任何歪曲事实的话。我的笔迹，见现存卷52卷175页。廖如愿的笔迹，见51卷19页；赵文栋的，见52卷。这些案卷，现存中共中央“经济检查委员会”。

1929年秋冬之间，刘奇同志命我去上海党中央短期学习。同一组的共三人：另二人是赵尚志和李维周。赵尚志同志是东北抗日联军将领，已于抗日斗争中牺牲；李维周同志原在中共辽宁省委统战部工作，现为辽宁省人民政协常委，正在统战与文史工作中努力。

由党中央受训回来后，我被任命为“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秘书”，协助组织部长做了一些工作。直到1930年4月被捕为止。

## 二、事件的起因

在立三路线指导下的“中共满洲省委”，为了显示力量，乘东北军阀张学良投意搞的“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”开讲演会之际，派人去演说反帝，被捕去三人，是这个事件的开端。

所谓“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”（以下简称“外协”），是东北军阀张学良投意组织的。它是讨好日美两个帝国主义，搞两者之间的平衡的，当进也反对苏联的。有人竟然说它是进步的爱国的组织，那完全是错误的，绝对不能相信。

这个会共有九名所谓“委员”，都是张学良同

意义的。他们是：

卢广绩(乃庆) 辽宁省商会副会长

金哲忱(振忱) 同 正会长

王金川 奉天省官银号总稽核

苏上达 商务印书馆沈阳分馆经理

陶宝珩 消费合作公司经理

刘大夫 辽宁省财政厅稽查员

徐 箴(士达) 辽宁省建设厅科长

卞宗直 辽宁省立图书馆馆长

陶宝珩(玉衡) 辽宁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

他们或为资本家，或为官僚，一句话，都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。只有陶宝珩一人，在抗战中入党，成了革命战士。

这个会的设立，是卢广绩(乃庆)副会长何德学良设计的旨意因而组织的；何以大权在卢的手里，他说了算。一切活动，由卢主持；用人权，由卢说了算；活动经费，即由商会费用开支；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陶宝珩当时只不过是九个所谓委员之一，不起什么大作用；更不是什么主席。有的说，不但其他外甥这个机构，而且指

高麗空班的身分，是与事实完全不符的，应当予以驳斥。这实际是对周同志的污辱，故不足取。

“中共滦州省委”对这样一个亲美、反苏的所谓“外协”，非常注意。命我打入该会，以便经常地了解它的动向。

我于是千方百计地进入了该会，成了一名秘书（或名干事）。该会共有两名秘书，另一人是朱映阶，是“外协”主要负责人卢广绩（商会会长）的沈阳高级师抗“同学”。此人现在还活着，年已六十餘，是“辽宁省人民政协”的办事人员，我们的同志李维周，便是他的上司。

在两个秘书之下，还有几名雇员，一为郝意周，是卢广绩的亲戚；一为佟某，是卢广绩任用的。此外还有，也见忘記。

如前所述，该会以卢广绩为主，操纵会务，更有任用办事人员的实权。会址即设在“辽宁省冀阳市商会”之内，经费也由商会开支。会址在商会院内一所东西走向三层楼以上，楼下是“冀报社”。这样，一进大门，路北便是。再往里走，便是商会的主楼。

商会主楼面向东，正对大门。东、南、北三面，都是二层楼。东面楼上是会长室及会议室，作为各个办公室。西为一层的大会场，可容四五百人。大会场西头是主席台，高一米多。长宽各约两丈，时常在上面演剧。

“外协”称“委员会”，利用商会的会议室；大会，即利用商会的大会场。

“外协”经常开讲演会，请人讲演。题目多为文化、教育、讲科学除迷信等，与政治无何关系。每次开会都印有入场券，以示限制。常有结余，以资招徕。为了维持秩序，均给“东北宪兵司令部”去信，请人临监（当时警察只管民刑事纠纷，故向束不通知）。每次开会，由九个委员轮流主持会场；我和朱焕阶两个秘书，轮班在会场照料。入场券由商会门前的“会房”（商会警卫队）代收，既替商会把关，也替“外协”把关。每次开会的情形，大致如此。

“外协”每次开会，不论内容如何，我均向党汇报。党认为与革命工作无关的，就不去管它了。

1930年4月这次会，名“泛太平洋会议讲演会”，是吹捧美帝国主义的；所以党特别重视。原来，美帝国主义想侵略中国，起步较晚；因而以“门户开放，机会均等”为号召，召开一个“泛太平洋会议”，做侵略中国的跳板。东北军阀张学良为了投靠美帝，命令原美国留学生、现为商务印书馆沈阳分馆经理、“外协”委员之一的袁士达去参加“泛太平洋会议”。“外协”开会，请袁士达演说，就是这个道理。

这次“泛太平洋会议讲演会”，由“外协”委员之一、商会副会长危广续主持。而应酬会场，按规矩由我负责。党给我两个任务：一是负责安全，印发给宪兵司令部的信；二是要入场券二十张，预备班一人去演说反帝，班人去呼口号、鼓掌助威。因为是我值班，所以都毫无阻碍地做到了。

由于“立三路线”做怪，党不仅派人去演说，还派多人去呼口号、鼓掌助威，以暴露了自己；而且没有布置任何应变措施；遂酿成第一次有人被捕的恶果。

当晚，卢广绩主持会场，做了简单介绍；即由苏上达开始演说。他们二人，都是在主席台上的。

这时，我党派去的赵高志同志，站在听众席第一排靠前的中间，面向听众，演说斥责。把苏上达的话打断，苏木立台上。

卢广绩立即由主席台上下来，问我：“给宪兵司令部的信发了么？”我做说：“发了”。他又问：“为什么没有人制止这个人的演说？”我说：“不知道”。卢怒气冲冲地说：“我给陈兴五司令打电话去”，便到楼上“会长室”去了。

当晚，一位女党员张光琪同志也去了。她携带传单，混到楼上，预备散发。听到卢广绩用电话告密，感到危险，便没有散传单而溜走了。这是以后了解到的，是卢广绩当晚告密的有力证明。张同志现已年过七旬，还健在；居住在沈阳市。

卢广绩的告密，是他的个人独断行动。和当晚演说的“外协”委员之一的苏上达没有关系；和当晚不在场的“外协”其他委员，也是没有什么

关系的。

我当时志气不好，但因党有委并未佈置任何应变措施，我只好暂且以目向赵高志同志示意；可是他讲话正在兴头上，毫不理睬我。他讲了一小时，方才完毕。苏上达这才继续讲下去，草草完毕。然后，散会。

### 三第一次捕人的情况

第二天清晨，党有委派来了一个人，他是昨晚自始至终参加了那个演说会的。他说：“昨晚散会，在退场时人们争相外出的比较混乱之际，由两个便衣夹一人，共捕去赵高志、杜兰亭、陈尚哲三个人。”又说：“赵高志演说，目标显著，当然必会被捕的；杜陈两人，低着头喊口号并鼓掌，被认为可疑，所以也被捕了。”

其次，他向我传达了有委的指示，即所有党团员，都要给商会会长虎广绩写悃帖信，每人至少十封；命令虎广绩放人。理由是在商会院内捕的人，商会长有重大责任，是罪魁祸首。必须这样做，来逼迫他。大家都这样做，人多力量大，他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，将不得不放

法放人的。

我还问他：“我要否搬家？”他说：“这是群众的反帝斗争，关系不大，似乎可以不必搬家”。他又说：“但还是要请示一下，再告”。以后，并无指示，所以我终于没有搬家。

这天，我到“革命书院”和“外协”转了一遭，当即买了不同街名的各中等学校的信封十多个，写了十多封同情信，寄给了卢广绩。以后了解到：别人都没有写，只有我写的十多封信；卢广绩一核对笔迹，就发现是我写的。因此，他向“宪兵司令部值线处长雷恒成”说，要严办郭某（我）。这就成了我“同情法团领袖”的罪状，因为卢广绩是商会副会长，按旧社会的法理认为是“法团领袖”的（参看下文）。

#### 四、第二次捕人的情况

“外协”委员之一商会副会长卢广绩向“宪兵司令部”陈兴亚告发：陈兴亚命令“宪兵值线处长雷恒成”捕去赵尚志、杜兰亭、陈尚哲三个人的事，已如上述。在“受审”时，赵尚志侃侃而谈“反帝”的必要性，等于当面训斥敌人，使其无话可答。